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青年学者论丛

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历史

李颖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青年学者论丛

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历史



李颖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历史/李颖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

ISBN 978-7-5098-1676-9

I. ①共… II. ①李… III. ①共产国际—历史—文集
②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 ①D16—53 ②D2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584 号

责任编辑:潘 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126 千字

印 张:6.37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1676-9

定 价:15.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序

欧阳淞

值此欢庆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即将问世。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我很乐意为这套丛书作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他满怀深情地指出:“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2012年5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广大青年提出了坚持远大理想、坚持刻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苦学习、坚持艰苦奋斗、坚持开拓创新、坚持高尚品行的五点希望。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包含着对广大青年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使我们深受教育、倍受鼓舞。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样取决于青年。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对广大党史工作者给予亲切关怀、寄予殷切期望。尤其是2010年党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以来,党史工作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新形势下,如何不断地以资政育人的新成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新的贡献,关键在人才,关键在青年才俊的不断涌现和茁壮成长。

党中央对党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党史工作面临的光荣任务为青年党史工作者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要实现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党史人才摆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进一步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建功立业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

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30多年来,几代党史工作者中的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献身党史事业的。他们无私奉献、奋发有为,为党史事业发展贡献了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又一代党史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进一步加强青年党史人才队伍建设,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骨干力量,进而成长为党史学界的名家、大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组织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就是在党史系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加强青年工作要求的一次重要举措,也是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搭建的一个重要平台。

这套丛书的第一批共有10册。每一册精选一位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研究人员在全国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部分党史研究论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可以促使青年研究人员在收获时间耕耘,通过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学术目标,增强不断奋斗的自觉性;二是可以搭建一个增进了解的平台,将我室的青年研究人员介绍给广大读者,将他们的作品介绍给社会各界,并增进他们与党史学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三是可以使青年研究人员从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中,寻找差距,弥补不足,优化治史方法,进一步提高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毋庸讳言,这套丛书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于青年研究人员来说,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段经历的回

顾,也是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毕竟,他们付出了努力,他们在成长、在进步、在成熟。故以“青年学者论丛”励之。

党史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广大青年党史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在党史工作宽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尽情展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为党史事业的繁荣发展而矢志奋斗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012年5月8日

目 录

.....

共产国际、苏联与国民党的改组	1
刘少奇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	12
五原誓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国民军的 关系和政策	26
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	37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58
陈独秀赴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解析 ——在俄罗斯发现的陈独秀的两篇报告	7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北伐	90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	107
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 历史演变（1920—1935）	120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4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 关系的比较研究	149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研究	173
后 记	194

共产国际、苏联与国民党的改组

在孙中山 1922 年 8 月至 1924 年 1 月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苏联起了重大作用,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共产国际、苏俄确定孙中山为同盟者

早在 1920 年 6 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提出:在绝对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①。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究竟哪些力量是革命的民主派,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共产国际与当时的苏俄的认识都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不断地派出使者到中国寻找同盟者。但在最初,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实行的是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疏远孙中山的政策。

共产国际、苏俄实行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吴佩孚、陈炯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版,第 53 页。

明的假象所迷惑。1920年吴佩孚通过直皖战争掌握北京政府大权后,伪装“革命”、“进步”,曾表示愿与苏俄改善关系,同意接纳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到北京,并通知原沙俄驻中国的使馆停止活动。接着他又取消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中日军事协定,派张斯麟赴远东共和国同苏俄谈判。1922年,吴佩孚又发出通电,主张“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工”。同样,陈炯明1918年率援粤闽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后,占领了汀州、漳州、龙岩等大片地区,建立了“西南护法区”。1919年底,陈炯明在漳州办《闽星报》,并口头上提倡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波塔波夫等相继到过漳州,他们都极力赞美陈炯明。作为共产国际“研究”和“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简报》在第7期的一篇文章中报道华南形势时,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矛盾的性质,而且表露了明显的褒贬倾向,把陈炯明称作“中国最先进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而孙中山却被说成是“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孙“在中国舆论界尤其革命知识分子中和劳动人民中的威望正在消失”,“他既远离发展中的正在摆脱封建束缚的年青的中国资产阶级,又远离劳动群众”。^①

共产国际、苏俄采取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还出于苏俄民族利益的考虑。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处境很难,它希望寻找一个同盟者以实现中俄睦邻关系。这个同盟者不仅必须对苏俄友好,还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共产国际和苏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页。

俄认为吴、陈具备这些条件,而孙中山则不具备。

事与愿违,共产国际、苏俄与吴佩孚、陈炯明结盟的意图成为泡影。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革命,他的名字从共产国际、苏俄可以结盟的候选人名单中被勾掉了。而在北方实行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下半年也遇到了困难,北京政府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优林使团坚持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而且苏俄红军未经北京政府的同意就开进外蒙,驻兵库伦,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中国工人阶级的鲜血使共产国际、苏俄认识到吴佩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极端反动的军阀刽子手。至此,经过曲折的过程和血的代价,共产国际、苏俄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才得以改变,转而开始重视并最终采纳马林的建议,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二、孙中山经过屡次挫折和失败,最后坚定了 联俄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对国民党本身的腐败是认识不足的,也无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而是热衷于北伐,希望用武力消灭北洋军阀。并且幻想英、美政府能够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以支持其北伐事业的完成。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曾先后派代表来中国与孙中山接触。1921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翻译张太雷经过湖南,前去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马林与孙

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在谈到承认俄国与联俄的可能性时，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还未完成前，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地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涉。马林则认为，国民党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导致这种干涉，劝说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但马林当时并未说服孙中山。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是促使孙中山改组的一个契机，也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没料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痛感国民党内部成分过于复杂，“人格太不齐”，初生改组国民党之意。这时，英美帝国主义却落井下石，逼迫孙中山避难所乘的军舰离开白鹅潭。在孙中山处于一生中最艰难困苦之际，共产国际和苏俄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给孙中山以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陈炯明叛变一发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通过孙中山的代表陈友仁转告孙中山，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苏俄站在孙中山一边。根据马林的报告，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专门下达了指令，明确地表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①，要求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8月25日，在李大钊陪同下，马林在上海法国租界再次会见孙中山，双方商谈了改组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马林告知孙中山，共产国际领导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同时，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运动;并建议孙中山“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①。经过马林等人的艰苦工作,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孙中山的思想有了重大发展。

三、共产国际和苏联全面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从1922年8月孙中山确定改组国民党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孙中山提出改组的方法是“以俄为师”,“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所以在整个改组,尤其是改组文件和党纲拟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②

1. 共产国际和苏联公开表明支持国民党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莫斯科给越飞两项使命,一是与北京政府商谈有关外交、商务关系等问题,二是与孙中山秘密商谈双方合作问题。越飞来华后,虽然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接触却进展迅速。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了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双方谈到中俄两国国内国际各种问题。经过马林、张继等人多方努力,终

^①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9页。

^② 1922年12月30日,苏联宣告成立。

于促成了孙中山与越飞的首次会晤。1923年1月26日,他们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在宣言中,苏联重申放弃在华特权,声明对外蒙无领土野心,双方表示以谅解精神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中国”。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对于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及其正在进行的改组都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化。这无论对孙中山本人还是其领导的国民党来说,意义都是空前的。孙中山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对西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虽然幻想屡次破灭,却始终不愿同西方公开决裂。由于共产国际、苏联不懈的努力和切实的行动,孙中山终于认识到,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军阀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①而社会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相反,“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②。以后,孙中山高举联俄旗帜,从改组国民党起步,开创了国民运动新局面。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1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624页。

其次,宣言的发表坚定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自1922年8月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起,就或明或暗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阻力很大;这时的孙中山在军事和物质上也极其需要帮助,而苏联政府在宣言中公开许诺援助中国的革命事业,这就使孙中山坚定信心,不屈不挠地同那些阻挠改组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斗争。而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右派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不敢公开破坏国民党改组及国共合作。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

2. 共产国际和苏联与国民党进行实质性接触

1923年3月,苏联政府决定向孙中山提供近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并答应孙中山的请求,决定派遣顾问到中国。1923年夏天,苏联政府向孙中山派出一流军事专家参加的军事顾问团。

这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9月2日到达莫斯科,11月29日返回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曾先后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全苏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会议。此外,代表团走访了莫斯科的一些工厂和军队,在彼得格勒和喀琅塔还参观了军事学校及海军部队。

在孙中山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的同时,鲍罗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并于10月到达广州。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

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经验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说:“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①。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孙中山不断委托鲍罗廷办理有关改组的重大事宜,如向改组会议做报告,提出改组任务;起草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章、党纲、一大宣言;前往上海,向上海执行部报告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征求修改意见;等等。

3.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思想和理论上帮助国民党

在1923年一年间,共产国际和苏联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国民党澄清了思想理论上的认识,保证了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胜利完成。

首先,说服孙中山真正认识改组的极端重要性及紧迫性。

虽然孙中山在1922年8月就决定改组国民党,并开了几次改组会议,发表了改组宣言,但孙中山并未从根本上认清改组的重要性,未集中全力抓此项工作。所以,直到1923年9月鲍罗廷来华前,国民党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当时,孙中山把工作重心仍放在北伐上,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说服孙中山相信,一切工作中,首要的是“国民党实行改组,转变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解放政党,这样的党将会使群众走上革命之路”^②。以后,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孙中山击退了

^①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版,第438页。

^②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陈炯明的进攻。这使孙中山越发相信鲍罗廷,几乎全盘接受他的建议。至此,国民党改组才进入实质性阶段。

其次,帮助国民党认清军事与政治及党与群众的关系。

1923年11月11日,孙逸仙代表团在苏联曾与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进行了旨在讨论军事计划的会晤。斯克梁斯基指出:当前孙中山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否则“任何军事行动必遭失败”,必将成为“冒险行动”。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莫斯科不赞成并拒绝支持代表团提出的军事计划,其中包括在南蒙建立新军队的设想。同时,斯克梁斯基表示:“进行军事准备是可能的,但这种军事准备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对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和政工干部进行培训。”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没有把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因此决议最后指出:“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①

共产国际和苏联经过不同渠道、通过各种方式向孙中山及国民党领导人反复申明以上思想观点。在制定国民党一大宣言过程中,鲍罗廷据理力争,坚持“必须把农民和工人吸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